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外译

——以《浮生六记》译本为例

单原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林语堂先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在其诸多译著中又以《浮生六记》最见功力。以该译本为例,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的翻译探索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通过翻译选择来挑战文化预设,并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下灵活应用翻译策略以求得中西文化共鸣的成功经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林语堂;中国文化外译;文化预设;翻译选择;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3-0061-04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翻译界,译入者甚众而译出者寥寥,文化交流的不平衡非常明显,“西方文化走进来”了,但“中国文化走出去”还路途遥远。而“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这条少有人走的“中国文化外译”之路上披荆斩棘,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当时在西方国家,人们“先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中国有灿烂的文化”。在林语堂先生的诸多译著中,《浮生六记》译本前后修改不下十次,是公认的最见功力的代表作,曾在西方引起不小的轰动,它集中体现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翻译探索中的成就,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翻译选择——挑战文化预设

翻译家尤金·奈达指出:“文化预设是指在一定社会中被人们所共识,但以潜在的假设形式存在的信条和理念。这种潜在形式为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群体所接受与共享。^[1]”在三十年代,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略有所闻,但知之甚少,“当然,他们知道,在地球的那一边有许多斜眼黄脸的中国人。他们想起中国时,会想到龙、玉、丝、茶、筷子、鸦片烟、梳辫子的男人、缠足的女人、狡猾的军阀、野蛮的土匪、不信基督教的农人、瘟疫、贫穷、危

险。他们所听见过的中国人,只有孔夫子一人。^[2]”

在那样一个半殖民的文化语境中的文化预设所带来的文化偏见(bias of culture)和意义真空(vacuum of sense)对于翻译者的信息传达无疑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要挑战这样的文化预设,已不是考虑翻译策略的“以归化为主”还是“以异化为主”所能获解的,首先必须从更为宏观的翻译选择开始。从翻译生态学来看,当时中国文化的外译属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输出,而翻译选择对于对抗“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贬抑,争取平等的文化话语权至关重要。

不同于同时代赛珍珠的《大地》中有了钱便要娶姨太太的农民,也不同于张爱玲《金锁记》笔下没落家族里为时局和钱财而扭曲的痛苦灵魂,林语堂先生选择翻译文本的首要目的并不是满足西方人对神秘的没落东方的猎奇心理,而是要向西方人展示中国最达观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哲学智慧的最高境界。《浮生六记》正是基于林语堂先生这样的翻译观而被选中,其文本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引人入胜的叙事性。

(一) 中国文化精髓的挖掘和重塑

林语堂英译本《浮生六记》始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国内学界在进化论影响下对中国文化以贬抑为主,常以腐败、昏愤、老朽、驯顺等

收稿日期:2013-06-27

作者简介:单原(1984-),女,江苏泰州人,讲师,研究方向:英语口语、英语教学。

等论之。而林语堂先生本着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既不盲目复古,也不一味崇外,在文化外译之初他首先对中国文化的精髓进行了挖掘和重塑。

其一,对于中国文化的局内人来说,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之旅,中国文化的自信在挖掘后重塑。《浮生六记》正是契合了林语堂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精髓的理解,它生动地记叙了清代文人沈复夫妇“布衣菜饭可终生”^{[3]19}的生活,涵盖婚姻爱情、家庭变故、闲情逸趣及山水游乐等故事,正是“中国处事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3]15}。

其二,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来看,文化于精妙处共通,越是精髓,沟通的障碍越小。当时的西方国家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洗礼,伴随着“西方的衰落”的思潮,“美国梦”的破灭和文坛上“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兴起,林语堂敏锐地抓住了西方读者的潜在阅读期待,即通过寻求东方文化智慧以获得更为理想的生活方式的启示。出版商华希尔说:“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地生活,如何品茗,如何行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这可能是美国读者最感兴趣的地方。”^{[4]232}

其三,重塑是为了更好地沟通。“作为深谙中西两种文化的林语堂,积极倡导中西文化,打破民族界限,以世界文化为最终目标。他并没有机械地把中国文化全盘输出,而是在输出之前先进行了过滤和选择,他输出的是经过他的思维模式过滤后重新排列组合过的中国文化。而且,在每一次新的输出之前,他常常会更新自己的思维模式。”^[5]

要想让习惯西方文化至上的读者放弃抵触心理,进而接受并欣赏东方文化,“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3]330},林语堂先生主要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转换视角,站到西方读者的角度,好比通过广角镜和长焦镜来观察东方文明,引领读者带着好奇和发现美的双眼来探寻东方文明的瑰丽新奇;二是调配,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此物之长去类比彼物之短,从而将社会分化的角色重新归于其原性。在《浮生六记》译者序中林语堂集中阐述了对于原文文本经“调配”和“视角转换”下的解读,笔者将其总结为两点“契合”:第一,沈复夫妇作为理想的个人本位家庭生活与西方个人主义人生观相契合;第二,沈复夫妇“恬淡自适”的人生态度与工业时

代被异化的人们回归自然的人类本性相契合。正因为如此,林先生译笔下沈复夫妇的“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3]19},能够超越国界和时代,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能得到读者的共鸣。

(二)引人入胜的叙事性

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译本深受读者喜爱,“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3]330},与其重视心理学的翻译思想有很大关系。林先生认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6]105}。而天下读者的共通之处,莫过于都会对引人入胜的故事手不释卷。《浮生六记》是沈复自传式的笔记体小说,记叙了自己与妻子陈芸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有“雅”一夫妇俩游山玩水填词联句,有“趣”一陈芸于神诞之夜女扮男装赴会观“花照”,有“愁”一穷困潦倒颠沛流离,有“哀”一这对伉俪最终阴阳两隔未能白头,如同一曲一唱三叹的乐章。

从翻译叙事理论的角度,“无论从字面意义或隐喻意义上来看,翻译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框架设定”^{[7]105}。从《浮生六记》译文来看,林语堂先生成功地运用了时空框架设定,即“选择某个特殊文本并将其置于时空语境中,并鼓励人们将触动生活的现有叙事与这种语境建立起联系,即使现有叙事的构成事件可能处于完全不同的时空框架中”^{[7]112},来消弭或缩小英文读者和原文作者之间的时空差异。例如开卷闺房记乐第一句:“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4]2},林译本为“I was born in 1763, under the reign of Ch'ien lung, on the twenty - 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 moon……”^{[4]3},将中国古代纪年法用归化的方法将其转换为西方人广为接受的公元纪年,很自然地能让西方读者联想到他们熟悉的《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叙事口吻,“I was born in the year 1632, in the city of York, of a good family, though……”^{[8]1},拉近了读者与译文的距离,利于译文读者接受源语叙事。

但是关注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并不意味着一味迁就,林语堂先生提出了翻译“忠实、通顺和美”的三个标准,并指出了译者的三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9]260}与后来谢利·布莱克的《浮生六记》译本那样大量删

减原文,改变原文顺序,将原文六章改为以沈复一生婚姻生活的发展这一时间链来贯穿的十二章的做法迥然不同,林语堂先生对原著内容基本全部加以保留,译文总体组篇和布局基本保持原文笔记体小说体例。深入挖掘原文的精髓,艺术再现原文的文字、艺术、哲学的精深,让译文读者原汁原味地体会到中国文学中的横生妙趣是林译本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也是林语堂先生对译者三重责任的身体力行。

二、翻译策略——变通中寻求文化共鸣

“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在《浮生六记》的译文中即体现在文字的“简”和“炼”：“简”，简洁明了，通顺自然；“炼”，看似平凡的文字实则经过了译者的精心“炼字”。林语堂认为“译文须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和言外之意”^{[9]266}，还根据语言学和心理学对“字神”作了相当科学的论述：“‘字神’是什么？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9]266}然而翻译中绝对的忠实是无法做到的，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译出更非易事，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就前后易稿不下十次，深叹“甚矣乎译事之难也”^{[3]330}。下文将举例分析林译本在变通中寻求中西方文化共鸣的翻译策略。

（一）得趣避“曲”

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译文：

Yun then had such fun looking at herself in the mirror.^{[3]60-61}

该句出自闺房记乐一章，陈芸在丈夫的怂恿下女扮男装赴会观“花朝”，是为喜剧高潮部分。“揽镜狂笑”，即陈芸被自己滑稽的装束所逗乐。然“狂笑”若直译为“guffaw”或“laugh loudly”，恐有损芸受过良好教育的优雅美好的形象，引起译文读者的曲解。林先生在翻译时弃形存意，因“狂笑”不在声高，而在趣浓，故译为“fun”，写意不写实，得“趣”而避“曲”。

（二）虚实相替

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踽踽时形。隆冬无裘，挺身而过。译文：

The income of the shop for three days was hardly sufficient to meet one day's expenses, and I was hard pressed for money and worried all the time. I

went through the severe winter without a padded gown.^{[3]136-137}

原文大量连用四字格，造成一种紧迫的张力，句短而意迫。“踽踽”，原指走路艰难；后指资财枯竭、匮乏；“时形”指经常出现，一家人生计维艰跃然纸上。林先生的译文详细解释了原文作者窘迫的经济状况，写实非常充分；而沈复的心理状态与原文相较，则简单淡化了，仅“hard pressed”和“worried”二词。这样淡“虚”浓“实”的手法，犹如绘画中一串自远及近的马蹄印，观之便知曾有良驹疾驰而过；窘迫的经济状况交代清楚了，读者自然能体会出沈复的百计无措。淡化了的悲苦，更衬托出在逆境中的坚强，突出了林先生所赞赏的“善处忧患”的品质。

（三）删补得宜

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以喻忠节之臣，洵不虚也。译文：

The ginger is by its nature the more biting the older it becomes, and it seems to me extremely appropriate therefore for it to be compared to old dour, veteran ministers of state, who often have more guts than the young ones.^{[3]232-233}

林先生的译文中去掉了桂，保留了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姜，且因为姜是前一句的主角，“诸味为花气所夺，唯姜味不变”^{[3]232}。“姜”，在英文中有充满活力的引申义，而中文读者所熟悉的“姜是老的辣”的比喻义，西方读者则不知晓。林先生巧妙地在后半句将此比喻义补出，自然而不显累赘。姜之辣，原文中对应“忠节”。“忠”者，“忠贞，忠诚”之意；“节”，“有气节”，含矢志不渝，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意思。若“忠节”二字仅译为“loyal”或“loyalty”则还未到位，经过林先生的炼字，“辣”为姜之气，对应至人，在英文中就是“guts”，才能传神。此句译法，有删有补，正是体现了林先生对“字神句气和言外之意”的把握。

林语堂先生是通过翻译实现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和成功典范，他的翻译思想及其翻译成就在今天仍然是一座“金矿”，值得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开掘。林先生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原理融入到翻译选择的大局观中，并在翻译实践中忠实实践

了“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原则,以及对原著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和对艺术负责的翻译思想。本文作者对林先生突破翻译困境的翻译选择和翻译

策略分析一二,期待能够对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 [1] NIDA Eugene A. *Meaning Across Culture*[M]. New York: Othi' s Books, 1981:15.
- [2] 林太乙. 林语堂传[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33.
- [3] 沈复. 浮生六记[M]. 林语堂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9.
- [4] 万平近. 林语堂评传[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 [5] 施建伟. 把握林语堂中西溶合观的特殊性和阶段性[J]. 华侨大学学报,1993(1):1-4.
- [6] 林语堂. 论翻译[A]//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 [7] 林语堂. 生活的艺术[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 [8]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C]. London:Edward and Arnold, 1978:112.
- [9] 丹尼尔·笛福. 鲁滨逊漂流记[M].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by Lin Yutang ——On His Translation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SHAN 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5, China)

Abstract: As a forerunner of Chinese Cultural Exportation, Lin Yutang had done many successful translations, among which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renowned as the best. Therefore it is chosen as a case to study how Mr. Lin triumphed in his attempts to export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to challenge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through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and to achieve cultural resonance through flexib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principle of “loyalty, fluency and beauty”.

Keywords: Lin yutang;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责任编辑:李开玲)